

吴可读与左宗棠的交谊

文/周奉真

清朝同治光绪年间,甘肃皋兰籍御史吴可读因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历史机缘,两人缔结了深厚的情谊,宛若寒夜双星,彼此映照。

弹奸初识

同治年间,陇右之地生灵涂炭。朝廷特派左宗棠总司平乱,其时部分官员履职不力,尤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为甚。

成禄(1823-?)，镶白旗满洲相连佐领下人，累功至乌鲁木齐提督。自同治四年(1865年)驻兵甘肃高台，七载间虚报军额、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。左宗棠决意参劾此人以儆效尤，整顿西北军务。他洞悉成禄虚报军情、欺上瞒下之本质，遂于同治十一年四月三十日上《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》，系统揭露其三大罪状。奏折直指成禄“谬率乖张，实难枚举”，请“简派知兵大臣接统该军”。

成禄暴行至权家屯血案达顶点。同治九年(1870年)五月，甘肃高台县权家囤庄生员李载宽、赵席珍等因秋粮歉收请愿缓捐，反遭成禄诬为“聚众谋逆”。左宗棠调查证实，成禄以“抗粮”为名发兵围庄，“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概行屠戮”，稚子蒙学亦未幸免。更诬以“剿灭叛逆”，奏称“阵亡把总仲瑞林、周得胜等应请议恤”邀功。左宗棠愤而上《武职大员苛敛捐输诬民为逆兵攻堡请旨查办折》，痛陈：“此实稍有心人者所不忍为，亦军兴以来所仅见。臣既察讯得实，若壅于上闻，何颜立于人世！”

御史吴可读继起上奏弹劾。吴氏早于同治九年夏便听闻有关成禄行为的传闻，然因“事关重大”暂未公开举报，而是暗中联络甘肃地方人士查证。待见到朝廷明发左宗棠奏折后，随即呈上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》，列举其任陕西督督雷正韶部属时，因庖厨煮面不熟竟斩首泄愤等罪状。吴可读更以“臣乡百姓莫非朝廷赤子”为引，痛陈当地民众“初遭战乱，继受匪患，复遇兵灾，今又遭官员荼毒”。奏劾指“成禄有可斩之罪十，不可缓之势五”，措辞严正，凛然生成。朝廷援引《大清律例》，拟对成禄处以斩立决。

然成禄系满洲贵族，竟得翻案。朝廷曲意回护，改斩立决为斩监候。吴可读愤而上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》，言辞激烈：“想见古人忠君爱国、奋不顾身之义，臣亦愿效此愚忱，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，悬之藁街，以谢甘肃百姓。然后再斩臣头，悬之成氏之门，以谢甘肃百姓。”少年同治，初登帝位，敏感异常，认定吴可读欺他年少，才敢语带嘲讽，如此放肆。据黄濬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记载：同治帝

“大怒，谓‘吴可读欺负我’，大哭，非要吴脑袋不可，原旨斩立决”。三法司会审，刑部希承上意，拟定吴可读死罪。清律规定，定人死罪，须“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十三堂官皆画诺，独家壁不肯，柳堂因此改流(放)”。惟因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，吴可读性命得保，御史职被撤，降三级调用。成禄则仍判“斩监候”，囚于狱中。

左宗棠虽与吴可读素昧平生，但在此事上展现了整肃纲纪的共同担当。左氏借此契机理顺西北军务，为后续经略奠基。念及此谊，左氏对吴可读青眼有加，成为终生挚友。在吴可读遭贬后，左氏感念其风骨，多方斡旋，力邀其回归故里，主讲兰山书院，以续士人经世济民之志。

同建贡院

自清康熙五年(1666年)陕甘分治设立甘肃行省，陇原士子须赴陕西参加乡试。左宗棠曾痛陈：“院士寒苦者多赴陕乡试，远者数千里……故士人终身不预秋赋者，尝十之七八。”道尽边陲学子跋涉之艰。及至左氏平定关陇后，正式奏请陕甘分闱，清廷允准甘肃独立建贡院。此举堪称“普天同庆”，然甘肃经十年战乱，财政支绌，建院资金筹措维艰。

同治十二年(1873年)春，吴可读间关跋涉，返故里兰州。是年夏，西征总戎左宗棠移驻兰州行辕。二人虽因参劾成禄早闻其名，此番方得初见。左氏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，同时请其以个人威望向甘肃各界募资建设甘肃贡院。吴可读对陕甘分闱期盼已久，感念知遇，毅然担此重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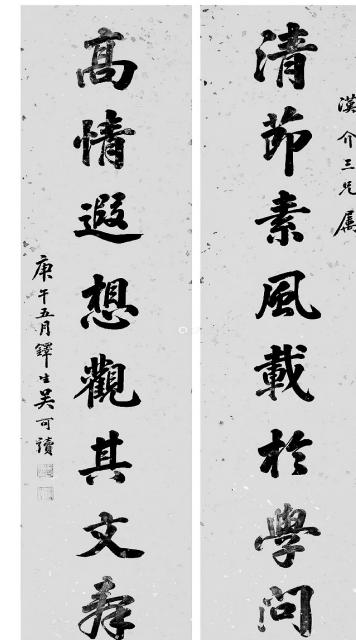
据安维峻《甘肃新通志》记载，吴可读“穿梭于各州县衙门之间，托钵于富绅商贾之门，劝捐到白银五十万两”。这简略而程式化的记述背后，实为惊心动魄的系统工程。吴可读需在既无专项拨款又无强制手段的情况下，凭一己之力完成巨资募集，其难度远超寻常公务。

吴可读《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》组诗及其自注，为这段历史留下鲜活注脚。其第十八首“雨雪霏微腊八前”句下自注：“时余奉文劝捐，北川将归。”甘肃腊月平均气温零下八至十二摄氏度，结合“雨雪霏微”之语，可见其冒寒辗转州县的艰辛。诗中“暗数流光惊过客，那堪生计逼残年”之叹，更道出六

旬劝捐者承受的身心煎熬。资金筹集中遭遇的舆论压力，在组诗第一首：“亡羊此夜悲歧路，失马当时说塞翁。”两句后作者自注得到印证：“时余劝捐已就绪，以浮议暂止。”所谓“浮议”，当指地方势力对巨额摊派的非议。吴可读既要应对官场中“各州县衙门”的推诿，又须化解民间“富绅商贾”的抵触，这种双重压力在其“亡羊此夜悲歧路”的比喻中显露无遗。从时间维度考察，吴可读的劝捐工作始于同治十三年春，持续至岁末。其组诗第二十九首“三百六旬此夜终”显示，除夕仍在核算账目。

光绪元年(1875年)贡院落成，当年应试者逾三千人，较分闱前增长六倍，印证了这项工程的实际效益。左宗棠在《奏请甘肃分闱疏》中强调“人文蔚起，边疆永固”，吴可读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在兰州城西北隅(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址)，甘肃贡院于光绪元年秋闱前建成，此年甘肃首次独立乡试如期举行，应试者逾三千之众。贡院落成显著提升本土士绅规模。张仲礼在《中国士绅——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》中的统计显示：康熙至同治朝150年间甘肃进士233人，而光绪朝13科即取士115人，占总数348人的33%。左



吴可读书法作品

氏家书载“兰山书院肄业者四五百人，各郡县闻风兴起”，印证“奏请分闱，添学政，益广文教”之效。自此，皋兰人文蔚起，西北边疆深度融入帝国文化体系，开启“文教敷施”的新纪元。

道义之交

吴可读与左宗棠之交谊，实根植于士大夫精神血脉的共鸣。在国是抉择层面，二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远见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十月，当同治帝大婚典礼与各国使臣觐见礼仪之争同时爆发时，吴可读上《请令各国使臣觐见不必跪拜疏》，直言“若因争此一节致启衅端，所关匪细”，既援《周礼》“以时制礼”古训，又引康熙朝俄国使臣免跪例，力主“礼以时为大”。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亦在奏折中疾呼：“礼以时为大，拘泥虚文而损国体，非智也”，更于私函中痛陈：“今之持华夷大防者，犹抱宋儒腐论，不知英吉利之坚船利炮已抵津门。”两份相隔几千里而呼应的奏疏，以“因时变礼”的务实主张打破华夷之见桎梏，最终促成清廷于光绪元年(1875年)六月十四日下诏准行鞠躬礼。这种政治默契更延伸至边疆治理：当左宗棠弹劾成禄虐政时，尚未见左氏其人的吴可读冒死上疏，以“可斩之罪十，不可缓之势五”相呼应。二人在此事上道义相济，更显士人风骨。吴可读因弹劾成禄获罪革职，陷入“长安居大不易”的困境。左宗棠三度致书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，考虑他旅费无著，彼此从未谋面，吴又不好开口，便安排友人谢维藩作为中间人代送川资：“如(吴可读)起程盘川无出，李筱轩处弟尚有寄存银两一二百金，当可代为筹算。”持久的经济援助更见左宗棠用心之深。吴氏尸谏殉道，据左宗棠家书中记载，他连续三年资助吴家：光绪五年——“以二百两为柳堂营葬”；光绪六年——“吴柳堂瞻家银千余两”；光绪七年——“吴柳堂世兄之恒处，弟曾划廉余千二百金界之”。这种持续性资助超越寻常官僚体面，实为士大夫“朋友有通财之义”的典范。

知音互赏，使二人精神世界高度契合。左宗棠评吴可读“骨鲠可风，意见微偏”，看似批评实则激赏：在晚清官场乡愿之风盛行时，吴氏的“偏”恰是士大夫风骨的棱角。吴可读



左宗棠书法作品

《呈左爵相七律二首》中有“感恩知己更何人，六十余年戴德身”句，视左宗棠为终生知己。将左氏比作“军中范韩名儒度”，更以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相许。此誉与左宗棠自诩“今亮”形成精神对话。光绪元年(1875年)，吴可读为左宗棠作寿联：“千古文章功参麟笔；两朝开济治栖爻”，上联取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喻，下联化杜甫咏诸葛亮诗意，既契左氏“文章西汉两司马”的自诩，更暗含对其“东戡闽越，西定回疆”功业的期许。当左宗棠将此联悬于中堂，叹“柳堂知我”时，道义之交已升华为精神知己。面对吴氏以身殉道的刚烈，左氏既批评其对同治帝“属入感恩图报之私”，又赞其“为正义而死者”的凛然气节，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，恰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完整呈现：既有“杀身成仁”的道义担当，亦存“发乎情止乎礼”的理性自持。

吴左之交，映照出晚清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光谱。在传统秩序崩解之际，他们以道义相砥砺，以国事相切磋，构建起超越利害的精神共同体。这种交谊不以权势为纽带，不因生死而断绝，恰如司马迁所言：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在晚清的天幕上划出一道璀璨的精神光芒。

【本文为甘肃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吴可读文集整理与研究》(2023YB129)阶段性成果】

明清甘肃古书院



甘肃贡院核心建筑“至公堂”旧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自明清以来，甘肃这片大地上曾遍布着一座座书院。它们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学府，更是维系西北文脉不坠、教化边地、培养士人的精神灯塔，在厚重的黄土地上，书写了一段文明传奇。

甘肃书院的兴起，与明清两代“治国以教化为先”的国策紧密相连。其发展轨迹，清晰地折射出中央王朝经略西北、文教敷施的深远意图。

明代是甘肃书院的肇始期。最著名的代表，莫过于由肃王府主导创建的甘泉书院(位于兰州)。肃王府作为明朝廷派驻甘肃的最高统治机构，其兴办书院的行为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，标志着儒学教育在边疆地区的“官方正朔”地位得以确

立。此外，如河西书院(凉州)、仰止书院(巩昌)等也相继建立，它们多位于府县治所，格局严谨，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主，为甘肃培养了最早一批的本土科举人才，使儒学文明的光芒持续照耀在河西走廊与陇中大地。

清代，尤其是乾隆之后，至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甘肃书院进入鼎盛时期。一方面，朝廷鼓励兴办书院，另一方面，在左宗棠等西北重臣的直接推动下，书院建设达到高潮。其中，兰山书院的崛起最具标志性。它由官方创办，被定位为“全省文教之枢”，是甘肃最高学府，全省优秀士子荟萃于此，其山长(院长)多为博学大儒，如清代著名学者吴镇、张澍等都曾在此执掌教鞭。与此同时，各地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，形成了兰

山书院——府级书院——县级书院的三级教育体系，使文教之风自上而下，深入边地。

在众多书院中，有几所尤为突出，它们特色鲜明，共同构成了甘肃书院的璀璨星空：

1. 兰山书院

位于甘肃兰州，是甘肃的“省会书院”，地位无出其右。其生徒来自全省，享受官费津贴(膏火银)，竞争极为激烈。教学内容以科举所需的八股文、试帖诗为主，兼及经史词章。左宗棠督甘时，对其极为重视，增拨经费，遴选名师，使其成为西北人才荟萃之地。

2. 求古书院

位于甘肃兰州，其创办意在弥补兰山书院偏重科举的不足。取名“求古”，意在“考究经史，溯本追源”。书院不设科举课程，专攻经史实学，生徒是已具相当功底的秀才。它与兰山书院一重科举、一重学术，相辅相成，满足了不同层次士子的需求，体现了清代书院教育的精细化分工。

3. 五泉书院

作为兰州府级的代表性书院，它承上启下，为府属各州县培养生员(秀才)，是士子通往兰山书院的必经阶梯。其规模虽不及兰山书院，但制度完备，管理严格，是地方教育体系中的坚实一环。

4. 柳湖书院

位于平凉城北的柳湖公园内，其地

风景佳胜，泉水潺潺。左宗棠在督师西征、驻节平凉期间，见此地人文荟萃但学舍简陋，遂捐出养廉银，下令重修柳湖书院，并亲书“柳湖”匾额。他增建学舍，募集书籍，并亲自为学子制定课程，倡导“读书当为经世之学”的务实风气。经此一番振兴，柳湖书院声名大振，不仅成为平凉的文化地标，更成为左宗棠在西北推行“教化”政策的一个缩影。

5. 陇南书院

位于甘肃天水。依托天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陇南书院学风扎实，经史并重。陇南书院的山长(院长)多由学问博洽、品行端方的硕儒担任。书院培养的人才，不仅服务于地方，更走向全国，成为维系陇右文化与中原文明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。直至清末新政，陇南书院亦顺应时势，改制为新式学堂，但其数百年积淀的学术传统与精神遗产，已深深融入天水的城市文脉之中，至今仍在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6. 阿阳书院

在陇中地区的静宁州(今平凉市静宁县)，阿阳书院是清代地方教育体系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存在。其名“阿阳”，源自静宁的古地名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。该书院由时任静宁知州主持创建，是典型的官办州县书院，其主要职能是为本州生童提供科举预备教育，并教化乡里。

这些书院的生命力，藏在独特的制度设计与教育理念中。建筑上，它们多遵循“讲学、藏书、祭祀”三位一体格局，柳湖书院的石桥牌坊、凤鸣书院的讲堂厢房，皆将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，成就“天人合一”的育人环境。管理上，“官办为主、绅助为辅”是普遍模式，官员捐俸、士绅输财与学田租税共同构成经费支柱，确保教育绵延不绝。教学中，既重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与试帖诗，也倡“经世致用”，寓地、算学、农书研究等实用之学并行，每月三次课试的严格考核与“膏火银”奖励机制，激励着学子勤学不辍。更可贵的是，书院常以楹联明志，“立异日功名，全在平时学问”的箴言，将修身与向学的理念深植人心。

至晚清光绪年间，“戊戌变法”后清廷推行新政，诏令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。甘肃的兰山书院改为甘肃高等学堂，求古书院清末改制后，最初改为“甘肃高等学堂预备科”，后因新政军事教育需求，调整为甘肃陆军小学堂，五泉书院改为兰州府中学堂。至此，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但其精神血脉，已悄然注入甘肃近代教育的肌体之中，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接力。

回望明清甘肃古书院，它们不只是冰冷的古建筑，而是数百年间无数陇人学子求知、思索与精神寄托的所在。在苍茫的西北大地上，这些院落里传出了琅琅书声，曾是这片土地上一道最深沉、最富希望的人文风景。它们所承载的兴学重教、经世致用的精神，至今仍是陇原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提醒着我们：文脉的传承，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真正力量。

(本版编辑综合整理)